精神世界里的社会画卷

——2008年长篇小说简述

马 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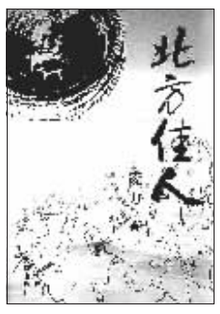
也许是由于出版市场“引力”的缘故,近年来,长篇小说大部分集中在年初推出。2008年即有《无土时代》、《所有的》、《小姨多鹤》、《我是我的神》、《北方佳人》等作品在年内持续产生影响。这几部小说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对于人的精神世界的高度关注。

《无土时代》是对中国社会现代性的反思之作。在这部小说中,作家赵本夫采用戏谑手法表达了现代人的精神焦虑。在没有“土地”的城市里,人像生活在套子里一样;农民慌慌张张拥进城里,村舍无人收拾日渐凋敝,土地荒芜一片凄凉。这难道就是我们追求的美好生活吗?作者带着对人类生存和发展问题的思考,以“荒原”意识切入当代生活,展示出独特的审美追求和价值理念。

《所有的》是一部深度剖析人性,展现女性心灵世界,充满智慧和哲理色彩的长篇佳作。擅长细节描述的女作家黄蓓佳,在这部作品中再现过硬的笔力。这部小说是精细的,犹如一把手术刀切入生活的经络,一丝一丝的剔开,一缕一缕的展示。故事沿着艾早、艾晚的生理和心理成长这两个叙事逻辑发展。生理成长逻辑在客观上推演出时代变迁,岁月倥偬给人心灵投下的印记,知性相当饱满;而心理成长逻辑,解释了意外事件产生的必然性,这既是小说家敏锐艺术嗅觉的流露,也是对时代精神的某种探询。一些看似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其实早就潜伏下来了,在那里发酵、滋生,等待爆发时刻的来临,这也是对人的无意识行为的文学表现。

严歌苓这几年似乎进入了写作的佳境,作品层出不穷,而且质量均在上乘之列。《小姨多鹤》是写16岁的日本少女多鹤,在日本战败、村民集体“殉国”之际,依靠机智生存下来的故事。后来多鹤被土匪论斤卖给了东北某小火车站站长的二儿子张俭,成为传宗接代的“工具”。新中国成立后,多鹤成了巨大的政治问题。张俭只好让多鹤成为朱小环装哑巴的“妹妹”,孩子们的“小姨”,然后通过不断地搬迁来遮掩多鹤的日本身份以及怪异的家庭关系。畸形的生存方式里生长着一种让人悲凉的温暖,这就是严歌苓的独特之处。她的作品不乏浪漫主义,但更多地体现在生命的血与泪之中,这就使得她所讲述的惨痛故事,有了神奇的审美价值。多鹤旺盛的生命力,还使我们在另一个层面看到了母性的对世界的重要意义。

《我是我的神》讲述了巨大历史变革下两代人的命运,以及他们对自由的向往和追寻。作家邓一光说,创作这部作品的冲动,来自对一些人类自身终极问题的思考。作家以类似“我究竟是谁?”这样的追问揭示了当代中国面临的人类精神问题。老父亲乌力图古拉,经历过自解放战争以来的各种磨砺,人生态度始终如一,既有坚守也有固执。儿子乌力天扬这一代努力寻找着不同于父辈们的人生价值。小说通过对亲情人伦关系的感性描述,刻画出当代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北方佳人》是女作家凌力继《少年天子》后又一部以大历史为背景的力作。小说描写的是“朱明亡元,元帝北奔”之后的被称为“北元”的那段历史。从蒙古人退回漠北30年的龙年写起,直到50年后再犯中原并俘虏英宗的“土木之役”为止。发生在中国北方的永乐皇帝3次亲征,蒙古汗廷6次更迭,3个瓦剌部落之间无休止的鏖战,以及部落与汗廷之间的争斗等等尽在其中。小说以身处蒙古政治漩涡的两位绝代佳人洪高娃和萨木儿为主角,她们是早于清孝庄太后200年活跃在草原政治舞台上的佳人。虽然是雍容华贵的王妃、公主,但一直在部落战争的漩涡中浮沉,被首领们像战利品一样夺来抢去,经历了奇特而苦难的人生历程。她们当过弃妇,做过俘虏、奴隶,受过鞭打,甚至只能以烤田鼠为食,但草原女性的坚强意志始终没有改变。她们是姑嫂,也是密友,又分属于两个对立的家族。当一人成为失败者时,另一人总是不计后果地拼死相救,人性的光芒在苦难中从来没有丧失。

下半年较有影响的长篇小说当数毕飞宇的《推拿》和蒋子龙的《农民帝国》,以及徐坤的《八月狂想曲》、刁斗的《我哥刁北年表》、党益民的《石羊里的西夏》、戴定南的《折腾》等。

《推拿》的主人公们不是某个人,而是一群人,一群生理特殊的人。他们看不见世界,而作家试图用笔去展开他们的心灵世界。其实他们无时无刻不在观望,他们观望自己,也观望他人,就像小说里那位“多亏了眼睛瞎了”的张一光,“眼睛好好的,他什么也没有看见;眼一瞎,他这个农家子弟却把什么都看清了”。毕飞宇的小说向来有向生活细部开掘的不凡功力,这是对一个小说家能否把想象还原成经验的考验。毕飞宇认为,《推拿》接到了自己1990年代写中短篇的路子上。不同的是,《推拿》更注重当代性和写实性。《农民帝国》虽然着力于农业文明形态中的乡村和农民,却超越了城市和农村、工人与农民题材的界限,是在整体上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转型期社会“痛点”的穿透。

畅销小说在今年也逐步进入了一个稳定的发展期。《藏地密码》堪称其中的代表性作品。西藏题材的小说近年来并不少见,它们多半是从流传很久的民间故事中演绎出来的。何马的《藏地密码》打破了这一模式,它以悬疑贯穿作品,运用引人入胜的情节、主人公坎坷的经历、动物之间特殊的语言交流、神秘主义色彩的主题,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全新的藏地叙事方式。《藏地密码》打开了读者心中的渴望之窗,同时又在读者心中留下了一些疑团,让人深思和回味。

本期视点

偏食与偏见

孙 郁

有一年因为什么问题,曾和友人发生过大的争论,我们各自都以为掌握了真理,在一些细节上吵个不休。我那时以为对方是偏执的人,几乎没有可对接的入口。后来因为读到一本相关的书,渐渐觉得以往的思路是窄的,才发现我的观点有点问题,是知识结构出了问题。我从自己的得失里发现,文人之间的争论,有时是偏食者的自言自语。合自己的胃口者好,不合者反之。类似的现象,现在还能在一些人的争论中看到的。

上世纪90年代,我因为要写一本关于胡适的书,阅读了一些资料,才注意到,近代以来,读书人的偏食是普遍的现象。只是民国间的文化生态与今天有别罢了。胡适在今天是热起来了,用他批评鲁迅的文章时常可以看到。我最初读胡适时,很佩服他的理性而温和的态度,是百年中国少有的思想者。这类人物现在也很少能见到了。但胡适也是个偏食的文人,自己的悖论也是很多。比如他过分强调实证,规范化,则把人文心性的自由也抹杀了。过于讴歌科学理性,把一切都确切化的时候,自己就易陷入陷阱里。其实如今现代性带来的弊端,倒是鲁迅早就看到了的。鲁迅当年讽刺胡适的思想,就是觉得他把一切说得太满,没有余地。而且一切为了“治”,从治国到治学,倒是没有了无治的逍遥。

也许天底下没有人不偏食的。因为偏,于是便有极端的意识,能引起人们的憬悟。马一浮一生偏于儒学,四书五经成了信念的东西。偏食的原因乃缘于自信,还有的出于怀疑。信和疑交错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马一浮治儒学是不偏食的。史与诗、礼与乐都得兼顾,所以他的气象比一般浅薄的儒学专家要大些。讲儒学之外的书籍,马一浮就有点陌生了,在这个范围内,他也显得偏食了。对现代哲学处于隔膜的状态。我由马一浮联想到另外一个浙江人木心,也是在审美领域很有建树的人。他读书很多,旧的一面有魏晋气,新的一面则是西方象征主义的传统。他对后者的研究很是不凡,相关的文艺作品都进入了他的视野。不过他似乎拒绝现代主义的文本,对非理性的艺术是警惕的。于是其创作越发显得精致和古典,是美的独舞,没有龌龊的意象在。要是没有思想上的偏食,大概就不会有书写者生命的特点。所以在讲到这个话题时,就陷入优劣具在、红白相间的语境,偏食的好与坏都在这里的。只是尺度与分寸的不同,结果也不同就是了。

偏食也带来了偏见的问题。比如丁文江吧,因为是留学回来的科学家,信西洋的学说,厌烦传统的道学,都没有什么不好。在地质学上对我国的贡献很大,那是有目共睹的。可是他一直不信中医,在生命垂危时,有中医不用,去找西医,而那时又没有西医的条件,结果耽误了医治。过于信什么的时候,也会毁于信的误区。死于所爱之地,古今可找出的例子是很多的。茅盾晚年一直想把《霜叶红似二月花》写完,但他排斥现实主义外的传统,自己和自己较量着,将民俗和鬼魂之类的市井和乡野之风关到了屋外,实在可惜。我对比茅盾早晚期的作品,开始是有气象的,后来过于拘泥于所信的方法,结果路越来越小。你看他读的书,大量是反映论的东西,关于神秘的和意志论的东西就比例不大。他后来的焦虑也未尝不与此有关。

我读了许多前人的书,最佩服的是鲁迅先生。他对科学理性和民俗宗教有着深切的理解。当人们耽于玄学的时候,他却强调科学的理性。当唯科学论占上峰时,他又注重心灵的漫游。选择了什么的时候,就又警惕着什么。不被俗谛所扰。鲁迅看似一个偏激的人,其实更带有合理性的一面。倒是他骂过的人,是偏得厉害的了。我每读他的书,都有惭愧的感觉。也敬佩他在那样的年代,为我们的文化写下了迷人的一章。其偏激的声音,响着我们的土地上最中正的旋律。用木心和陈丹青的思路来说,不是鲁迅出了问题,而是我们这个社会有了毛病。外表走偏锋的鲁迅,其实在正路上呢。我们什么时候能像鲁迅那样警惕偏食的误区,看人看事就不会那么单调了吧。

读书琐记

文化让艺术得以传承

——《文化造就艺术——中国艺术文化巡礼》推介

徐丽梅

生命从哪里来?又去往何处?在有限的生命里又如何得以超越?人类在享受工业文明带给世界的火箭、电脑、磁悬浮列车的同时,对内心诗兴的追求与向往却与日俱减,随之而来不得不面对现实世界中艺术的缺失。当人们的内心在不经意间被一幅画作,一尊雕像甚至是一片出土的陶片所震撼之时,对内在灵性的探求也渐渐被唤醒。艺术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了内心的感动与愉悦,无论是创作者和观赏者都冲破了被社会僵固了的模式,让内心回归到了一种本真的状态,一种让人所痴迷的纯粹而崇高的艺术世界。而以上这些,正是张延风所著《文化造就艺术——中国艺术文化巡礼》一书中所传递给读者的一种信息。

单纯从书名来讲,命题似乎过大。然而如果细细地翻看其中的内容,却又觉得二者本来就相依相生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作者张延风以自己多年对西方文化艺术的独到眼光,同时又参看了大量的中国艺术珍品,他恰当地站在了东西方文化交汇的点上,超越了文化的局限来解构和探讨中外文化艺术。《文化造就艺术——中国艺术文化巡礼》所涉猎的内容几乎贯穿了中国自古以来不同时期、不同朝代的文化艺术,书的内容也不仅局限在绘画艺术的范畴,更多的是面对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同时还对人类社会的文化起源与艺术流派对现时的影响进行了完整的梳理。该书中,特别对华夏文明以来中国文化的发展脉络更有着极具深度的理性思考,作者认为:“世界观、人生观的巨大变化必然波及到文艺观,使文学和艺术观念发生巨大变化。既然外在的地位、行为和操行是表面的、暂时的、肤浅的,而内在的精神、才学与心理是深刻的、永久的,那么过去认为是雕虫小技的文学和艺术创作就具有了巨大的精神价值……”作者好比一个漫步者,徜徉于历史的长河之中,从最早的原始图腾、祖先崇拜,到后来魏晋时期画家文人纷纷突破禁忌,重新寻找和建立多元化时代的到来,再至后来,佛教东渐、诸子百家,直至当代审美艺术,都逐一做了论述。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如果以地域来区分文化的异同似乎更容易读懂。以文化的发展牵动艺术的兴盛,从而使艺术光照人间。艺术家的创作所带给人们至美的艺术享受,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着不同的历史烙印。三晋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和巴蜀文化,分别都有着充分的个性空间,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千年之前的今天,楚国工匠曾对铸造艺术迷恋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制造了流芳百世的青铜器,代表作如《樽盘》,它由无数细如火柴的铜梗构成,似蚯蚓,互相缠绕几乎难以使人相信是由青铜器烧铸而成的,书中对此进行了精妙的叙述。如此精湛的工艺,不禁让人怀疑艺术家手中抚摹的不是坚硬的金属,而是柔软的面团,这也是典型的长江以南艺术的代表之作。

张延风不仅着墨于中国古代艺术,乃至山水诗人,水墨艺术,女性艺术,西画传入等等方面都有涉猎。齐白石的二级组合、黄宾虹的黑厚之形乃至潘天寿、张大千等等,作者也都对他们的画作做了精辟的论述。不难看出作者对文化艺术发展所具有的敏锐的观察力。艺术无国界,在中西文化交融日渐繁华的今天,只有立足于人类文化这个浩大的背景之下,才会让人们对各种艺术流派有一个认知过程,这也是《文化造就艺术——中国艺术文化巡礼》所带给读者的启示。

书海拾贝

读书的前途

白 雪

什么是出版业的繁荣?如果书积压在书店或是出版社的库房里,那就不能算作“繁荣”而应说是“浪费”了。但从几家有影响的读书俱乐部的种种创意、举措以及那直线上升的会员数字,书店在各种媒体上的排行榜,各报纸的读书专版中可以看出读书人的生存空间正在拓展,与此同时,日趋觉醒的读者也开始向出版社说起“不”来。这正是成熟的市场和强有力的监督促成的真正出版繁荣。

对绝大多数的读书人来说,读书是为了修身,为了使自己更加完善。在这一点上,东方人无疑看得比西方人更远一些。常常有外国的学者很不理解何以在他们国家只能卖几百本的关于古埃及历史或古印度哲学的研究著作,译成中文以后竟有上万的销量。而实际上中国从事该专业研究的人员肯定是极少的。显而易见,书是被读书人买走了。他们或出于兴趣,或因为责任,再就是自古流传下来的藏书遗风。我常常为中国有许多这样的布衣读书人感到自豪,这样一个读书阶层在西方不曾有过,它们那里是大众休闲,学者钻研,不像我们除了教授和研究员以外,还有一大批尖端领域学问的业余爱好者。他们读书无功利心,无思想负担,读书在他们是一种乐趣,一种他们自由选定的生活方式。他们使平淡的生活透露出些许的高贵,他们让书斋枯坐的学究感觉出脚下的大地是坚实的,他们尤其使出版社感觉到所面对的市场并非像理论意义上那样狭小和可怜。所以,读你认为对自己有益的书,不随波逐流,赶出版商们炒作的“畅销书风”,这样才能算作一个有成熟心态的读书人。

过去的读书人或多或少存有一丝幻想,因为他们客观上已具备了“士”的候补阶层的功能,所以他们读书的领域便要受到一些限制,修身养性之外,还要经世致用。今天的读书人毫无任何掣肘,可以按自己的兴趣去博览群书,相对专门的学者,他们才算是实现了最大限度的读书自由。排行榜是根据他们的购买量而定,读者俱乐部亦是专门为他们服务的机构。随着人数的快速增长,会有更多的出版社将他们引为主要的消费对象。有不少读书人,他们虽没有著书立说,但其渊博的知识,触类旁通的征引,妙语连珠的谈吐,让你由衷感到平凡的伟大。学问应是人人可做的,而以何种心态去做恐怕就成为是否成功或成功大小的关键了。

一家之言

梅兰芳的“戏口袋”齐如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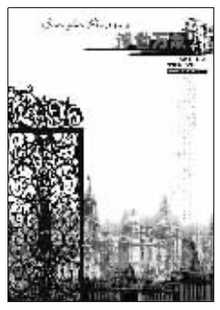
孙曜东

抗战之前围绕在梅兰芳身边的文人就有一大帮子了。冯耿光先生从梅14岁时就看好了他的发展前途,开始与之交往,其他还有吴震修、许伯明、李非殊、叶恭绰、王楞柏、罗癭公、许姬传等,后来到了上海又有赵叔雍、沈昆三。画家中与之交往的有齐白石、陈半丁、汤定之、吴湖帆、吴昌硕、顾鹤逸、吴子琛等等。这些人的业余生活几乎都泡在梅的戏里。那时梅兰芳每晚演出回家吃夜宵(有演出他就不吃晚饭了,仅在下午四五点钟吃点点心),陪他一同吃的总有两大桌子人,大家边吃边议论,今天哪里有突出的好,哪里欠了点火候,这些人都是一心为着梅好,说话也直截了当,各抒己见。梅则从善如流,闻过则改,只要你讲得有道理,下次立马就改。梅的这种涵养和敬业态度,我想也是诸多文人名士愿意靠拢他的重要原因。

这帮文人当中最为不易的是黄秋岳,他不仅为梅参谋戏,还为他办理文案。在戏的方面,初期是以黄为主,黄出事之后才是齐如山。比如梅演《霸王别姬》,黄把那段历史给他讲透了,虞姬的性格也就悟出来了,演起来才能得心应手。而黄是个什么身份的人呢?人称其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此话一点不假。因为市场是一个客观的标准,他为人写寿文是500大洋一篇,够一个中等的小康之家生活一年。汪精卫非常赏识他的才华,曾请他当秘书,杜月笙也请他写字,他的字独具风骨。他是福建人。清末民国初,福建出了一批才子,一直到抗战之前在文坛都很有影响。其中一个梁鸿志,曾以诗文称雄文坛,古文底子很厚,曾收藏了宋代人的33封信,其中包括苏轼的信,故名其书斋为“三十三宋斋”,然而他独独服黄秋岳。齐如山称其黄老师,罗癭公视其后生可畏。如此身价的黄某,竟愿为一个“戏子”办理文墨,只能以英雄见英雄,才人惜才人来解释了。后来日本人打过来之后,他向日本人传递情报被蒋介石枪毙,那是后来的事。黄秋岳死后,黄家的管家王妈就到梅家管家,梅家的钥匙都归她管,极尽职尽责。

梅身边的二号文人才是齐如山,齐如山的确是为梅兰芳出了大力的。

民国初年,齐如山就看梅兰芳的戏,平时他有些想法想跟梅谈一谈,又觉得素不相识有些冒昧。有一次,他看了梅兰芳演的《汾河湾》,心里有些想法觉得不吐不快,于是就写了一封长信给梅兰芳,其中有道:“昨观《汾河湾》,演得很好,一切身段,都可以算是美观,尤以出入窑之身段最美,所以美,原因在水袖运用的合适,于身段增色很多,以后仍应再多注意。此戏有美中不足之处,就是窑门一段,您是闭窑后,脸朝里一坐,就不理他了。这当然是先生教的不好,或者看过别人的戏都是如此,所以您也如此。这是极不应该的,不但美中不足,且甚不合道理。有一个人说他是自己分别十八年的丈夫回来,自己虽不信,当然看着也有点儿像,所以才要他述说身世,意思是那个人说来听着对,便承认。倘说的不对是有罪的。在这个时候,那个人说了半天,自己无动于衷,且毫无关心注意,有是理乎?别的角虽然都这样唱,您则万万不可,因为果如此唱法,就不够戏的原则了……而且这一段是全戏主要的一节,承认他与不承认他,全在这一套话,那么这套话可以不注意吗?再者,听到他说起当年夫妻分离的情形来,自己有个不动心、不难过的吗?所以此处旦角必须有极切当的表情,方算合格,将来才能成为好角。”同时,他还根据剧情的逻辑联系,分析了其他几个地方,如薛仁贵和柳迎春的表情问题等等,均能言之有理,句句中肯。



齐如山发了信自己心中如释重负,至于梅兰芳能不能收到,即便是收到了会不会有什么效果,他全不在意。谁知梅兰芳接到信后却很认真,他认为齐如山很懂戏,分析得合情合理,于是就试着按齐如山的意见把戏默走一遍,果真自己也觉得顺理成章、自然多了。认定这样改动一下,才符合剧情的发展,于是在接下来的一次与谭鑫培合演《汾河湾》时,就大胆地对柳迎春的动作和表情作了改动。那天演到薛仁贵追到了窑门被关在外面,有大段唱工,谭的唱自然是台下叫好阵阵,可是在一段过门中,在这个不应有“好儿”的地方,观众却叫起了“好”。谭开始觉得很奇怪,后来发现梅兰芳正坐在椅子上做身段呢,那“好儿”是冲着梅兰芳来的!谭老板开始有点不高兴,后来一琢磨,这样改是有道理的,就顺水推舟地把戏唱下去了。台下看戏的齐如山发现自己的信起作用了,于是更加起劲地给梅兰芳写信,几乎是每看一场梅的戏就要写一封,指三道四,直抒己见,由此他们成了好朋友。

后来,齐如山在戏里越“陷”越深,干脆别的事情也不干了,就成了梅兰芳的“戏口袋”,不仅为梅兰芳出谋划策,改进旧戏,而且在梅兰芳有志创作和表演新的历史剧的时候,更是大显身手。一个好的设想,往往是由梅党中某一个人提出,再由几个人先议论起来,渐渐有了“戏胆”,梅兰芳也有了灵感,迫切要求赶快编出来的时候,再由一个人执笔写出剧本,然后再由梅与王少卿、王幼卿等设计唱腔、动作、服装等,而这个执笔人常常就是齐如山。

上世纪30年代初梅兰芳组团赴美国访问演出时,齐如山也是立了大功的,他赶写了《中国剧之组织》、《梅兰芳的历史》,编印了《梅兰芳歌曲谱》,又组织画工画了剧场背景图案。总之,一切为了让美国人能看懂并喜欢上梅兰芳的戏。这个目的,后来的实践证明是达到了,而且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是京剧走向世界的第一声。

摘自《浮世万象》孙曜东 口述 宋路霞 整理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5年5月版

书 摘